

视 点

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变革

欧阳向英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构建起“三大支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三大模式”。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国际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与旧有的“三大模式”相对应，新变革具体表现在技术革命与产业重构、债务危机与金融体系调整以及能源转型加速上，其中数字经济、多元化货币体系和新能源将成为变革的核心推动力。中国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壁垒、优化环境，为全球要素流动提供了稳定预期；通过推进制度型开放升级，打造高标准全球合作平台；通过补短板、强优势、建机制，成为全球产业链稳定运行的核心枢纽；通过践行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理念，推动经济全球化均衡发展。中国以内部改革与全球治理相协同的非零和博弈路径，为破解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6)03-0103-0021

【关键词】世界经济体系 经济全球化 大国博弈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外交政策非西方化调整与中俄美关系发展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25AGJ018）阶段性成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作为国际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这不仅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产业链分工的调整，还体现在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上。为此，厘清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原因及其表现，分析其对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深远影响，既是回应“世界之变”和“中国之问”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

一、旧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及其局限性

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生产、贸易、金融等要素就会突破国界限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其间需有统一或普遍认可的规则做支撑，于是全球化经济体系出现了。关于全球化的起点，学术界存在多种说法。有人把 15 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作为全球化的起点，也有人把 18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 19 世纪资本主义扩张形成全球市场这一时期作为全球化的重要阶段。我们认为，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全球化不只表明人们对世界地理认知的突破，还强调全球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合；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兴起也不在同一时段，前者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于 21 世纪初（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并成为塑造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与国家间联系方式的核心力量。在这一阶段，全球经济构建起了“三大支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大模式”，至此“旧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就形成了。

衡量某一世界体系形成的标准是：有相互关联的要素，有一定的结构和边界，虽有变化但能保持动态平衡。按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这两个周期使波动的体系维持了动态平衡。^①所谓动态平衡，是指每次循环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没有回到最初的平衡点，而是实现了新的平衡。当这两个平衡机制失效并且找不到修复方法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会越来越偏离平衡点，乃至出现结构性危机。在旧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世界呈现出了这样的状态——虽然国

^① See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Depression: A Long-Term View." October 15, 2008. <https://iwallerstein.com/the-depression-a-long-term-view/>

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不平等，但以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等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持续释放活力，加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和美国主导制定的规则统治力很强，所以世界经济体系维持了相对稳定。但随着旧的全球经济“三大支柱”日益动摇，广泛应用的“三大模式”也逐渐丧失可持续性，世界经济体系迎来了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重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与国际秩序，还将进一步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深度调整。

旧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是什么，又是如何动摇的？所谓“三大支柱”，一是指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货币与金融支柱。1944 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两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构成了旧全球化体系的金融基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稳定汇率和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则专注于长期发展融资。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这两大机构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机制，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统一的货币框架。1971 年，因美国黄金储备不足、财政赤字扩大，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史称“尼克松冲击”），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然而为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核心国家达成默契：OPEC 成员国出口石油须以美元计价结算，所得石油收入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这一安排促成了石油-美元-美债的闭环：全球石油贸易用美元结算→各国为进口石油必须储备美元→美元需求获得支撑→美国通过发行国债回收美元来降低融资成本。就这样以石油定价权替代黄金储备，美元体系重新获得了信用支撑。二是指关贸总协定（GATT）主导的贸易自由化支柱。1947 年签署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5 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旧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第二大支柱，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和遵循非歧视原则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GATT/WTO 体系的重大贡献在于乌拉圭回合谈判（1986—1994）实质性结束，而谈判取得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签署。这标志着 GATT 从临时协定升级为 WTO 这一正式国际组织，并建立起了覆盖世界贸易全链条的规则网络。WTO 首次将长期游离于多边规则外的农业纳入了框架，要求成员国削减出口补贴和降低关税壁垒。^①此外，还通过《纺织品与

^① 欧盟被迫逐步取消对糖、乳制品的出口补贴，美国则调整了棉花补贴政策。基于此，全球农产品贸易额从 1995 年的 6 000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1.3 万亿美元。

服装协定》(ATC), 废除了实施近30年的《多种纤维协定》(MFA) 配额制度。在2005年配额限制取消后,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出口额同比激增30%, 从而不仅直接改变了全球纺织业的面貌, 而且改变了全球制造业的地理分布格局。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关税税率从平均6.3%降至3.8%^①,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约束关税税率降至14.4%^②,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三是美国主导的技术和产业分工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在多个科技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 其优势不仅体现在信息技术、国防军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材料科学、农业科技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上, 而且体现为通过产业生态布局、国际规则制定和资源整合形成的系统性统治力。美国产业分工的全球布局并非完全依靠市场自发形成, 而是以跨国公司为核心抓手进行战略规划和资源调配的产物。美国是全球跨国公司数量最多、营收规模最大、技术垄断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最强的国家。近年来, 美国政府推出各种政策, 将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回撤到以美国本土为主, 并逐渐形成了高端控制、低端代工的产业格局。美国的技术领先与垄断本质上来说是资本、人才、规则三重霸权叠加的结果, 即通过知识产权控制技术制高点, 通过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 通过国际规则巩固垄断地位。由此, 美国主导并构建起了“中心-外围”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凭借这“三大支柱”, 世界经济又形成了“三大模式”。一是增长动力模式。发达国家通过信贷消费和福利体系维持高消费水平, 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终端需求市场; 新兴市场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禀赋和政策优惠, 建立了出口加工产业, 生产出来的工业品通过全球贸易流向欧美, 再以原材料进口和技术引进等方式完成循环。全球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欧美消费能力, 新兴市场经济易受欧美需求波动影响; 贸易顺差多集中在新兴市场, 而资本、技术和品牌优势则向发达国家集中。二是产业分工模式。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专利、研发能力和品牌优势, 占据了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 以及下游的营销、金融服务等高端环节; 新兴市场则依托要素成本优势, 承接了产业链中游的组装、加工及低端零部件生产等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环节, 从而通过低成本竞争嵌入了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高度依赖跨国公司的布局, 各生产环节按成本最优原则分布在不

① 李旭谦:《乌拉圭回合谈判》, 载《青海草业》2002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世界开放报告202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第5页。

同国家和地区，而利润向产业链上游集中，新兴市场在分工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三是国家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通过控制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开采权和运输通道以及国际定价体系，掌握全球能源供给的主导权。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均以化石能源作为主要动力来源，并通过大规模消耗能源推动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从而形成了能源消耗-工业增长-经济扩张的发展路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呈强正相关关系，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大量的碳排放。发达国家利用能源霸权获取经济红利，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能源的进口和定价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工业化成本较高，碳排放强度自然也高于发达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张，世界经济也呈现出了“繁荣”和“稳定”的假象。为什么说是假象？因为繁荣和稳定是可见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这一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和不平等本质。

第一，主导权失衡与规则不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们不仅能在全球层面快速响应危机并协调资源，同时也是最权威的全球性规则制定平台。IMF 和世界银行都规定，重大决策需获 85% 以上投票权支持；投票权由基本票和份额票相加得来，其中占比最大且最关键的是份额票。IMF 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分配以经济规模为基础，但计算公式长期偏向发达国家。

IMF 的份额计算公式是包含国内生产总值（GDP）（50%）、开放度（30%）、经济波动性（15%）、国际储备（5%）四个指标的加权计算公式，其中 GDP 是由混合计算得来的——60% 基于市场汇率（MER），40% 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美国以 MER 和 PPP 计算的 GDP 大体相当，而中国的 PPP-GDP 远超 MER-GDP。由此可知，这种设计会导致发达国家的 GDP 被高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被低估。IMF 的投票权由基本票（5.502%）+份额票（94.498%）构成，其中基本票是给每个成员国固定分配的，自 1944 年以来从未调整过，而份额票是由成员国每持有 10 万特别提款权（SDR）对应 1 票确定的。虽然历经几次改革，但美国的投票权均维持在了 15% 的否决线以上。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改革是 2023 年第 16 次份额总检查，IMF 执行董事会提议“通过增加永久性资源和减少对借入资金的依赖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所有成员国按当前所占份额比例等比例增资 50%。

这项议案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得到 IMF 理事会的批准 (92.86% 的赞成票, 超过 85% 的最低门槛), 据此各国相应增加了出资额。^①根据 IMF 官网 2025 年 7 月 31 日数据, 在普通基金账户中, 美国持有的份额为 829.942 亿 SDR (约合 1 125 亿美元), 占 IMF 总份额的 17.42%。^②美国的份额增加有一部分是明确的, 就是根据各国普遍增资 50% 的决定, 美国从 421 亿 SDR 增至 631.5 亿 SDR, 但还有近 200 亿 SDR 来源不明, 可能包含额外的特别增资或计算方式调整。对此, IMF 官方和美国财政部都没有给出特别说明。虽然美国在 2024 年 10 月批准增资时附加了“冻结份额重新分配”的条件, 但 IMF 官网在公布最新的增资情况时还附带给出了投票权的微调结果, 目前美国的投票权为 16.49%。^③同时显示, 中国的份额为 304.829 亿 SDR (约合 413 亿美元), 占 IMF 总份额的 6.40%, 投票权为 6.08%。^④

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也由基本票 (5.55%) + 份额票 (94.45%) 构成, 其中基本票是给每个成员国固定分配的 500 票, 占总投票权的 5.55%, 这一比例自 1988 年以来从未调整过; 份额票是由成员国每持有 1 股 (约 10 万美元) 对应 1 票确定的。世界银行的份额分配综合参考了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和国际收支状况等指标, 份额数量与成员国认缴的股本直接挂钩; 同时, 份额分配还长期依赖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约定。2025 年, 世界银行完成了新一轮份额调整, 这是自 2010 年以来的首次重大改革。调整后, 中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 的认缴资本占比从 4.68% 升至 6.01%, 投票权从 4.5% 升至 5.71%, 成为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国。美国认缴资本占比从 16.89% 微降至 16.77%, 投票权从 15.89% 微降至 15.87%, 仍以 0.87 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过 15% 的否决线。欧洲国家 (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等) 的投票权占比合计为 11.85%, 这样就可通过联合投票形成“隐性否决权”。^⑤

① IMF Publication. *Sixteenth General Review of Quotas-Report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nd Proposed Resolution, and Proposed Decision to Extend the Deadline for a Review of the Borrowing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 1. <https://www.elibrary.imf.org/downloadpdf/view/journals/007/2023/059/007.2023.issue-059-en.pdf>

②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Position in the Fund." July 31, 2025.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in/tad/exfin2.aspx?date1key=2025-07-31&memberKey1=1020>

③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June 4, 2026. <https://www.imf.org/en/About/executive-board/members-quotas>

④ Ibid.

⑤ 参见《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IBRD) 和国际开发协会 (IDA) 投票权改革概况》,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 2021 年 12 月 22 日, https://gjs.mof.gov.cn/dhjz/gjjrz/sjyhjt/rdjj13/tpqgg/201011/t20101112_348702.htm

IMF 和世界银行是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重要机构。正此，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都要求按经济规模重新分配份额，但 IMF 和世界银行的份额与投票权计算公式设计，本质上来说还是国际权力历史结构的数字化投射。通过 GDP 计算方法、指标权重、否决权机制的三重锁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 IMF 和世界银行的主导地位得以固化。IMF 贷款往往附加严苛条件，要求受援国实施财政紧缩、国企私有化和市场开放政策，这些政策与“华盛顿共识”高度契合，本质上服务于美国资本利益。2020 年，美国以“防止伊朗获取资金”为由，动用否决权阻止 IMF 增发 5 000 亿 SDR；2022 年又施压 IMF 暂停向委内瑞拉提供抗疫贷款；在 2023 年世界银行批准的贷款项目中，约有 40% 贷款流向了与美国战略利益高度相关的国家和领域。不难发现，这种政治化操作使两大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的工具，其职能也沦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延伸。也正因如此，在资源分配方案、贸易规则、债务条款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迫接受两大机构设定的不平等条件。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表面的繁荣实则是发达国家对经济红利的优先占有。

第二，贫富分化加剧。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于 2013 年 9 月以法文版首次面世，2014 年 3 月又推出了英文版，该书证实了贫富分化加剧论断的客观性，被誉为“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之一”。托马斯·皮凯蒂耗时 15 年构建了涵盖 20 余国、纵贯 300 年的世界顶级关于收入的数据库，从而首次通过系统性地整合税收记录、国民账户、历史档案等多维度资料，为收入不平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核心理论观点是资本回报率（ r ）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 g ），这一不等式被视为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驱动力。当 $r > g$ 时，拥有资本的群体（如公司股东、房产所有者等）财富积累速度远超依赖劳动收入的群体。这种差距经过代际累积，最终导致财富向顶层集中，这无疑加剧了资本富余型国家和劳动密集型国家的贫富分化。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言：“自 1970 年以来，世界各地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不尽相同，这再次表明了体制和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①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产业链高端锁定、金融资本扩张等手段，持续收割全球经济利润，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了“资源诅咒”陷阱和低端产业依赖的困境，以致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全世界已实现现代化的国

①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5 页。

家和地区仍不超过 30 个，总人口约 10 亿，不到全球人口的七分之一”^①。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使得经济“繁荣”仅惠及少数群体，而非全球共享。

第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高度依赖资本自由流动和美元霸权，却缺乏有效的全球监管机制，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危机、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到近年来的供应链动荡危机，频繁的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所谓“稳定”，本质上而言是资本扩张周期暂时维持的平衡，一旦矛盾激化便会崩塌，而危机的代价往往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见表 1）

表 1 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影响

维度	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影响时限	全球金融危机（2008）影响时限
GDP 复苏时长	2—3 年（东亚）/5 年（印度尼西亚）	3—5 年（东欧）/2—3 年（非洲）
贫困率恢复	5—8 年	7—10 年（非洲）/5 年（南亚）
制度重建	5—10 年（印度尼西亚）/3—5 年（韩国）	10 年以上（希腊）/5 年（印度）
综合倒退	3—8 年	5—10 年（东欧）/3—5 年（非洲）

资料来源：笔者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历史报告和公开数据库编制

第四，发展权的不平等与依附性陷阱。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时，往往被迫以出让经济主权为代价换取准入资格，比如为获取 IMF 贷款而接受紧缩财政约束，为吸引外资而开放关键产业，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而放弃关税保护，等等。这种“主权置换”形成了三重依附“枷锁”：一是技术封锁，由于高端产业链被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往往沦为组装车间；二是市场扰动，比如非洲国家多依赖原材料出口，经济命脉易被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所裹挟；三是跨境金融风险，例如拉美国家总外债占其 GDP 比重过高，且以美元浮动利率债务为主，因此当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后，资本外流、本币贬值与偿债负担上升便形成了负反馈循环，极易引发债务违约。“华盛顿共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更强化了这种依附性：国企私有化让外资控制能源、金融等国家战略领域，贸易自由化摧毁本土幼稚产业，金融开放使热钱流动成为经济动荡的导火索。埃及、阿根廷等国曾因短暂快速增长而被视为经济发展典范，却在外部冲击下迅速崩盘，从而印证了“增长而不发展”的悖论。这种依附状态下的“稳定”，实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暂时平衡状态。一旦全球经济周期逆转，发

① 《求是》编辑部：《怎样理解四大全球倡议》，载《求是》2025 年第 20 期。

展中国家便会成为危机的首要承压者，也就是说其发展权的实现始终受制于外部规则，难以突破依附-动荡-再依附的闭环。

二、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等问题得以暴露，标志着欧美的消费驱动模式不可持续，于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开始从单极依赖转向多极分散。这里所说的“多极”到底有几极，哪些国家或地区算是其中一极？说法不一。1971 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提出的全球五大核心力量是指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这就是经典“五极论”。一般认为新“五极论”所称的“五极”，一是指美国——技术霸权和消费能力双轮驱动；二是指中国——庞大体量和创新驱动；三是指欧盟——依靠绿色经济与区域整合；四是指印度——人口红利与工业化的新星；五是指东盟——区域协同和产业链重组的枢纽。如果单纯看经济，那么多极化也可被认为是中国-东盟、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的“三足鼎立”。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划分多极化，都说明世界经济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变动，而美国却因不甘心失去其单极世界霸主地位，开始积极推动全球和区域组织的“去中国化”重构，这是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的主要原因。

（一）技术革命与产业重构

进入 21 世纪以来，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第四次科技革命（亦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次科技革命的核心特征是数字技术推动了物理世界与生物系统的深度融合，并且主要表现为人们借助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群体性突破，实现了对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重构。但是，这种重构也伴随着诸多难题和挑战。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在大幅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使低难度、高重复性工作岗位面临被替代的风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 2023 年 7 月发布的报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下一个前沿生产力》中，分析了全球 63 个应用场景，结果发现金融领域的数据处理、风险评估等任务实现自动化的潜力高达 60%—70%，其中金融分析师的财务建模、市场趋势预测等标准化工作，以及保

险核保人的风险评估、保单审核等流程性工作，因高度依赖数据的结构化分析和规则化处理，而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渗透最快的领域。^①而相对来说，教育、医疗等需要人际互动的行业更可能通过 AI 实现效率提升而非被 AI 替代。总的来看，量子计算与 AI 的协同革命使世界更加两极分化，掌握这两项尖端技术的国家会加速起飞，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沦为技术应用的“试验场”。世界经济论坛于 2025 年 1 月发布的《2025 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将净增 7 800 万个岗位，但与此同时也有 9 200 万个岗位面临转型。^②这意味着学校教授的知识和人们取得的学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贬值，同时强调能力培养而非知识掌握也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教育旨归。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但近年来其科技垄断地位已开始动摇。迄今为止，美国在六大核心领域尚保持技术领先，分别是半导体与芯片设计、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生物技术与医药研发、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能源开发与绿色技术、工业软件与精密制造，并通过构筑知识产权壁垒、实施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实施金融资本控制、发挥人才“虹吸”效应与把控技术代差等措施来维持垄断地位。在美国领先的这六大领域，中国正在紧紧追赶。在半导体与芯片设计领域，2024 年中国芯片出口额超过了 1 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芯片出口国之一，但其中主要是中低端芯片，高端芯片制造能力则因制造设备缺乏和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而有待突破，这也成为半导体产业的一大短板。在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院士带领的中科大团队实现了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全球领跑，2024 年 12 月问世的“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机是其团队在超导路线上继“祖冲之二号”后取得的又一突破。“祖冲之三号”因与“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形成了技术互补，处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了 15 个数量级，超越谷歌公司 2024 年 10 月公开发表的最新成果 6 个数量级，这是中国量子计算领域的里程碑式成就。目前，潘建伟团队正在开展码距为 7 的表面码纠错研究。在生物技术与医药研发领域，中国的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研究论文发文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自然》

① Michael Chui, Eric Hazan, et al.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I: The Next Productivity Frontier."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ckinsey-live/webinars/the-economic-potential-of-generative-ai-the-next-productivity-frontier>

② World Economic Forum.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 pp.5, 18. https://reports.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Report_2025.pdf

《科学》上的研究论文（即 CNS 论文）数量不到美国的 20%，反映出了与世界顶尖成果的差距。在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全球航空航天产业竞争格局中，中国呈现出了高速迭代的发展特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完成全球组网，其技术性能已对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构成了实质性竞争；载人航天方面，天宫空间站以其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与常态化稳定运行，展现了中国在这一复杂工程系统集成领域的技术成熟度；深空探测方面，“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完成月球采样顺利返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揭示火星浅表结构与液态水存在证据，凸显了独具特色的深空探测技术路线。尽管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发展迅速，但在低轨卫星互联网技术、火箭回收技术及相关产业生态建设层面仍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在能源开发与绿色技术领域，中国已构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中国还是唯一实现特高压技术大规模商业化运营的国家，同时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等领域的创新活力也居全球首位。中国的工业软件国产化率持续提高，但高端工业软件仍被西方垄断，生态规模差距显著。在精密制造领域，2021—2024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全球占比一直稳定在 50% 以上，年安装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总和，是美国的 7—9 倍。目前工业机器人已在中国的消费电子、汽车零部件等中低端精密制造场景形成规模化产能，但生产工业机器人所需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赖度仍较高。值得强调的是，当前半导体产业链重构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美国通过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并投入 527 亿美元推动实现芯片等半导体元件的本土制造。在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鼓励”下，台积电公司计划在其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座工厂生产 3 纳米芯片，这预示着该公司芯片产能向“友岸”转移的加速。中国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构建起了自主算力网络，并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先进封装技术等领域实现了突破。尽管美国对于中国购买极紫外线光刻机（简称“EUV 光刻机”）实施了严苛的出口禁令，中国仍在 5G 基站芯片、新能源汽车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模块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应用。总的来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很强，但发展时间毕竟较短，仍处于追随和模仿阶段，要全面赶超美国还需较长时间。欧洲虽然在基础科学研究、绿色科技和精密制造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其他创新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数字经济是当前世界最具渗透性、颠覆性的核心驱动力——既重构了产业的要素基础与技术体系，又主导了组织形态与价值链的变革，还为其他重构方向提

供了底层支撑。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7.5 万亿美元^①,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 38.6%。美国凭借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长期占据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数据,2022 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17.2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超过了 65%。目前来看,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是中国的 2 倍多,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了这场技术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基于这一认识,中国若能把握住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跃迁机遇,通过推动制度创新与全球治理重构,完全有可能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在产业重构的过程中实现飞跃式发展。

(二) 债务危机与金融体系调整

2025 年,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指出,截至 2025 年第二季度末,全球债务总规模已达 337.76 万亿美元,创历史最新峰值。^②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其发布的《2025 年度经济报告》中也指出,“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已升至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之上。虽然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低利率的情况下,高债务或许是可持续的,但当前及预期的状况看起来并非那么有利”^③。

从区域国别角度看,日本和美国分别是债务规模最大和债务占比最高的两个国家。截至 2024 年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 317 万亿日元(约合 8.78 万亿美元),占 GDP 比例高达 230%,远超第二名希腊和第三名意大利。若仅计算中央政府债务,这一比例在 2023 年就已达 263%,表明日本长期为发达国家中债务占比最高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约为 134%,中国约为 88%(含城投债)。截至 2025 年 10 月底,美国政府债务已达 38.3 万亿美元,占全球政府债务总量的 33%。这一规模是日本(9.8 万亿美元)的 3.9 倍多、中国(18.7 万亿美元)的 2 倍多。^④日本的债务相对安全,因为是以国内融资为主的“内向型债务”,加之日本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所以尚可维持。但经济增长乏力(2024 年 GDP 同比增速仅为 0.8%)和人口老龄化严重,可能引发日本陷入长期衰退。

① 参见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 <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1/P020240326601000238100.pdf>

② "Global Debt Hits Record of Nearly \$338 Trillion, Says IIF." <https://www.politiceconomistng.com/global-debt-hits-record-nearly-338-trillion-says-iif/>

③ "BIS, Annual Economic Report." June 29, 2025. p.3. <https://www.bis.org/publ/arpdf/ar2025e.htm>

④ Niccolo Conte. "Ranked: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Government Debt in 2025."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ranked-countries-with-the-most-government-debt-in-2025/>

而美国的债务是以国际融资为主的“外向型债务”，这就使其风险被集中置于美元信用透支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上。美国债务的危险性在于“滚雪球”效应——高债务引发高利率，利率上升又会进一步加重债务利息支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的债务危机已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而美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消除”和美元霸权的弱化趋势，都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美元储备地位持续弱化，黄金重新成为避险的“安全港”。截至 2024 年末，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已达 20%，从而超越欧元成为第二大储备资产。各国央行持有黄金主要是为了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同时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①2024 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业务中的份额达到了 3.75%，稳居第四大支付货币地位；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了 23%，达 64 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行的“熊猫债”规模同比增长了 32%。^②东盟十国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后，2024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了 35%，占区域贸易总量的 28%。2025 年 6 月 6 日，中国银行在其发布的 2025 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中进一步指出，东盟国家工商企业对于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反映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东盟地区基础稳固。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比例已达 85%，金砖国家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的总体份额也从 10 年前的 2% 提升至 40%。这一趋势表明减少对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的依赖，有助于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贸易的冲击。

全球债务危机与货币体系重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债务压力削弱了美元的信用基础，而货币体系多极化又为债务风险分散提供了可能性。美债发行的不可持续性表现、美元储备份额的趋势性下降、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性进展以及黄金储备的持续性上升，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去美元化”与“多极化”并行的新世界图景。然而，美元的网络效应以及美国在 IMF 和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拥有的否

① Anja Brüggem, Maurizio Michael Habib, et al. "Gold Demand: the Role of the Official Sector and Geopolitics." June 2025.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other-publications/ire/focus/html/ecb.irebox202506_01~f93400a4aa.en.html?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kb2NfcG9zaXRpb24iOjAsImRvY19pZCI6ImY2ZDI2YzQ1ZTFiMTZkN2EtZjg2YTFlYjg5MDc4Y2RlNiIsImlubGluZV9kaXNwbGF5X3Bvc2l0aW9uIjowfQ%3D%3D&openprice=1

② 姚进：《位列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第三位贸易融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5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2/content_7005133.htm

决权，必将使得这一新世界图景的实现进程长期充满以多方博弈为表征的不确定性。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未来数字货币技术的突破与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或将成为打破现有格局的关键变量。

（三）能源转型加速

由全球碳计划（GCP）统筹发布的《2024 年全球碳预算》报告，将人为碳排放分解为化石燃料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和土地利用变化排放，其中化石燃料排放是绝对主导项，占比超过 80%。国际能源署（IEA）也将碳排放统计的核心目标聚焦于化石燃料排放，因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人为驱动因素，同时也是减排政策的核心控制对象。

1995—2024 年，全球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从 220 亿吨增加到了 374 亿吨，年均增速约为 1.8%；在其间的 2020 年，排放量受疫情影响短暂下降后又快速反弹。从行业角度看，电力和热力生产造成的碳排放量占到了碳排放总量的一半左右，交通运输业约占四分之一，制造业和建筑业约占五分之一。全球碳排放的主要增长因素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能源需求持续上升、高耗能产业扩张、清洁能源替代速度不足以及部分国家减排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等。从国别和地区角度看，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前两大碳排放国。2024 年，中国的碳排放量约为 111.73 亿吨，占全球总量的 31.5%；美国的碳排放量约为 46.19 亿吨，占全球总量的 13%。^①中国的碳排放量相对来说过大，是我们长期承受国际压力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承担约 70% 的用电峰值保供任务。也就是说，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但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占比仍低于煤电，能源转型任重道远，仍需时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的年排放量约为 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中国年排放总量的 20% 以上，因此亟须通过技术升级和能源替代实现转型。随着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启动，中国碳市场面临的国际压力也将更大，亟须多管齐下加大减排力度。自 2021 年碳市场机制启动到 2025 年 3 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口径电力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了 8.78%，减排成本降低了约 350 亿元人民币。^②2024 年，随着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也被纳入碳市场管

① IE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orldwide Rose in 2024, Mainly Due to Emissions from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ttps://www.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international-issues/carbon-dioxide-emissions-worldwide-rose-in-2024-mainly-due-to-emissions-from-the-asia-pacific-region/>

② 高敬：《首次扩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增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载新华网 2025 年 3 月 26 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3/content_7015718.htm

理,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2024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2亿千瓦,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2025年7月,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式开工,建成投运后预计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超2.4亿吨。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040万辆,电动汽车月均销量超过120万辆,相比2021年5月底的20万辆,堪称增长迅猛。毋庸置疑,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将为中国的减排事业做出重要贡献。2024年,欧盟的碳排放量约为32亿吨,较10年前下降了15%;而非洲及中东、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较10年前分别增长了25%、15%和9%。2014—2024年,俄罗斯的碳排放量总体来看基本持平,仅小幅增长了1%—3%,显著低于非洲及中东、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增速,但也与欧盟的明显下降形成了对比。

“高碳工业化”曾经是很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路径,如今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全球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成为国际共识,于是全球能源结构开始加速向可再生能源倾斜。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确定了《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细则。至此经过十年谈判,全球碳市场机制终于落地:各方就国际碳信用交易规则达成共识,包括碳信用标准动态更新机制和避免碳排放量重复计算的核查程序等。这一机制设定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目标,据此预计,到2050年每年可引导1万亿美元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在此次大会上,25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签署协议,承诺停止新建无碳捕集技术的燃煤电厂。这一协议覆盖了全球近40%的煤电产能,标志着国际社会首次针对化石燃料淘汰问题形成了实质性约束框架。中国、印度等煤炭依赖度较大国家未选择直接加入,印度尼西亚宣布将在15年内全面退出煤电,转而发展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低碳能源投资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其中中国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增长量;成熟绿色技术(如光伏、风电等)吸引了1.93万亿美元投资,同比增长14.7%,而流入氢能、碳捕集等新兴绿色技术领域的投资下降了23%。^①随着2024年10月

^① BloombergNEF. "Global Investment in the Energy Transition Exceeded \$2 Tr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24, According to BloombergNEF Report." January 30, 2025. <https://about.bnef.com/insights/finance/global-investment-in-the-energy-transition-exceeded-2-trillion-for-the-first-time-in-2024-according-to-bloombergnef-report/>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见》逐步落实，氢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中国的替代性能源选择，而智慧电网、储能系统、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中国角色及其世界意义

当前世界经济体系正在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旧有的以单一货币主导、中心-外围分工、传统能源支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做出系统性改革部署，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锚定了方向，更为破解全球经济结构性难题提供了关键支撑。

2024 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①这种稳定贡献在世界经济频繁遭遇“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当下，更加凸显了如同中流砥柱般的支撑作用。作为推动世界经济结构性变革的关键力量，中国将发力点放在了促使内部改革与全球治理深度协同上。《建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与部分国家推行的“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一，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壁垒、优化环境，为全球要素流动提供了稳定预期。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机制；出台并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推动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市场环境；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推动招标投标市场全国一体化监管，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全面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和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制定出台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意见，为新能源产业跨境合作提供稳定的要素价格环境；优化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流动机制，让全球资源在国内市场高效配置；等等。

第二，推进制度型开放升级，打造高标准全球合作平台。2023 年 6 月，国务

^① 《聚集共赢 谋求正和——坚定做“赋能型大国”》，载人民网 2025 年 2 月 24 日，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pc/content/202502/24/content_30058403.html

院印发相关文件，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旨在以此推进制度型开放升级。经过一年多先行先试，试点措施全面落地并形成经验。2024年，国务院发布文件进一步部署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其中有17条措施被推广至全部自贸试验区，13条措施被推广至全国，从而实现了通过试点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的目标。^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为落实货物贸易创新机制要求，实施了“不因原产地证书微小差错拒绝给予优惠关税待遇”举措，并通过优化通关监管模式等方法，使符合条件的进口空运快递货物实现6小时内通关，一般货物48小时内通关，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得到了持续提升。

第三，通过补短板、强优势、建机制，成为全球产业链稳定运行的核心枢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在芯片制造、高端材料等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以降低对外部单一供应源的依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领域筑牢保障根基；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力度，提升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质效，让民营经济在产业链配套中发挥更大作用；等等。此外，还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依托，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2021年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规模已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投资超过1600亿美元，共建国家对华投资超过800亿美元，数据凸显了这种双向投资合作的日益深化态势。^②

第四，践行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理念，推动经济全球化均衡发展。自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给予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100%税目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待遇。据此可以预计，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③，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未来3年中国政府将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用以支持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

① 《商务部召开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https://www.mofcom.gov.cn/xwfbzt/2024/swbzkzmsyqgzxtxwfbh/index.html>

② 高乔、郭钰恒：《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空间广阔》，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2025年8月19日，http://www.scio.gov.cn/gxzl/tydl_26587/zxtj_26590/zxtj_26591/202508/t20250819_926982.html

③ 《习近平：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4年11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8022.htm

伙伴行动”，涵盖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兴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和安全共筑十大领域。^①可见，中国通过多元合作、单边开放等举措，让全球化成果更多地惠及了发展中国家。

中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同时，也为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树立了典范。尽人皆知，旧有全球科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层级结构，核心技术与标准制定权被少数国家垄断，技术扩散存在显著壁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并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打破科技与产业转化的障碍，构建起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政策的有力引导下，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不仅已形成全球竞争优势，而且逐步成为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重要力量。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网络，截至 2024 年底，5G 基站数量达 452.1 万个，占全球总量的 60% 以上；基于 5G 的工业互联网项目已覆盖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百家全球领先的 5G 工厂平均产能和产品质量均有大幅提升。在先进制造领域，中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持续增强，2023 年出口额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2024 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突破 200 万辆，锂电池产量在全球所占比重达 76%，光伏产业已形成从硅料到组件的全产业链优势。《建议》提出的“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科技开放合作”，为中国打破旧有全球科技体系垄断格局，推动全球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使新质生产力成为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动能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顺应全球金融体系多极化趋势，要求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机结合，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深度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目前，《建议》提出的“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机制”等举措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 2025 年 9 月底，仅沪股通累计成交总额就达 90.1 万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沪）累计成交总额也达 37.5 万亿元人民币。^②截至 2025 年 9 月底，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

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摘要），载《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6 日。

② 毛艺融、田鹏：《互联互通机制优化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载《证券日报》2025 年 10 月 23 日。

的托管余额已达 3.8 万亿元，占中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总量的比重为 2.0%。^①同时，中国在跨境贸易融资、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也逐步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并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起的数字货币桥项目中发挥核心作用，旨在推动建立多边跨境支付新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是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其作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方向，要求通过贸易结算-投资融资-储备货币的渐进路径，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提升。截至 2025 年 9 月底，人民币已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同时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中排名第二，在支付货币中位列第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保持第三位。从具体数据看，2024 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的人民币金额达 175 万亿元，较 2020 年增长了 286%。截至 2025 年 10 月末，CIPS 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 187 家，间接参与者 1 559 家，分布在全球 122 个国家和地区，业务可通过 5 000 多家法人银行机构覆盖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②此外，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也取得了突破。2024 年，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开展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为全球货币支付体系提供了新选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③通过学习领会《建议》精神，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角色的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了非零和博弈的新路径。与旧体系下的霸权逻辑不同，中国通过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实践，逐步打破了“中心-外围”的分工格局，并且正在致力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随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规划的深入实施，中国将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并在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体系变革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2025 年 9 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载中国人民银行网 2025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pbc.gov.cn/jinrongshichangsi/147160/147173/4fcd4805da2645cea4ec79ad9d2be602/index.html>

② 《CIPS 系统参与者公告》（第一百一十四期），载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网 2025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cips.com.cn/eportal/ui?pagelId=44425&articleKey=6b13d6c5ec4f4257af0704156b728d34&columnId=44433>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5 年 10 月 28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Китай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Оуян Сянъин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ускорением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 невиданных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о лет,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являющая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ундамента, претерпев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Три главные основы" и "три главные модели" старой глоб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иес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бладают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проявляющимися в дисбаланс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расслоении на богатых и бедных, частых кризисах и в неравенстве в прав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Накопление эт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ослаблением "трех главных основ" привели к системным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аких трех измерений как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лговой кризис и упорядочивание финанс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ускорени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хода, раскрываются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ая валю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замещен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яемые стали ключев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дан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Китай, следуя пути игры с ненулевой суммой,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внутренних реформ 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едложил вариант реш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проблем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отвечающий интересам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в этим его уникаль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и значимост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глоб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Economic System

Ouyang Xiangying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s undergo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three pillars" and "three models" of the old globalized economic system formed after World War II suffer from inherent limitations such as imbalances in power, widening wealth gap, frequent crises,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rights. The accumulation of these limitations, along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three pillars", has triggered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debt crisis and financial system adjustment, and accelerated energy transi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a multipolar monetary system, and renewable energy substitution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China, through a non-zero-sum game approach of "coordinating internal reforms with global governance", offers a solu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global economy, which has uniq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words: World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global governance